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中的辩证法^{〔*〕}

王先俊,朱兆华

(安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获得巨大成功,取得丰硕成果,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了“连续性”与“阶段性”、“老问题”与“新问题”、“世界的”与“民族的”、“传统的”与“现代的”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中的辩证法,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历史给予我们的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辩证法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1.11.00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了解历史,才能看得远;永葆初心,才能走得远。”^{〔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有百年历史,站在新的时代方位,回顾和反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过程,犹如从高处俯瞰来路,可以更好地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持续推进提供经验和启示。

一、“连续性”与“阶段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既是连续的,又是分阶段的,是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每一阶段都有其独特的历史内涵和使命要求,并为下一阶段提供前进的基础和台阶。从党的成立到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实现了三次历史性飞跃,每一阶段、每一次飞跃彼此连接、前后相继,共同书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彩华章。

从党的诞生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个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党的历史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两个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并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他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

作者简介:王先俊,博士,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朱兆华,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本文系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研究”(AHSKZD2018D01)的阶段性成果。

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2]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经过艰苦探索、付出巨大牺牲积累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3]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革命最终取得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新中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华民族历史新纪元。由此开始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历史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围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任务开始了新的探索。在这个时期,毛泽东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强调“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4]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一系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观点,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在这个时期也出现了失误。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个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党的历史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新飞跃,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利实现了当代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迷误”到“新飞跃”的转变也由此开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科学发展观”,“成功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5]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发展战略、政治保证、祖国统一、外交和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次新飞跃。

从党的十八大开始至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一个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一次实现新的飞跃,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后,国内的社会主要矛盾变了、发展阶段变了、任务和要求更高,而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此,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伟大的历史主动、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高度的行动自觉,锚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在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新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6]这个飞跃还在继续。

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往往表现为历史的连续性、因果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进程的三个历史阶段、三次历史性飞跃不仅是连续的，而且具有历史因果关系。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7]如果没有第一次飞跃，就不会有第二次飞跃的产生和发展，同样，如果没有第一次、第二次飞跃，也不会有进入新时代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同时，历史发展的辩证法还表现为历史发展的阶段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历史中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任务，要解决的是不同的问题，不同任务、不同问题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历史分成不同的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8]所阐明的就是历史的延续性和因果性、阶段性和时代性。认识到这种连续性、因果性，就不会犯割裂历史、将不同阶段彼此对立的错误；而认识到这种阶段性和时代性，则会领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性，避免陷入思想保守、僵化的泥沼。

二、“老问题”和“新问题”

撩开历史的面纱可以发现，历史发展其实就是在解决一个接着一个问题中前进的，历史变革的承接转换往往也是同一个接着一个问题，特别是那些带有根本性和全局性问题的解决以及解决的程度和效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历史发展规律，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世界史本身，除了通过提出新问题来解答和处理老问题之外，没有别的方法。”^[9]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也同样如此。

鸦片战争以后，向何处去成为近代中国根本性问题。出路何在？这一重大历史课题急迫地摆到中国人面前。为挽救民族危亡、探寻国家出路，中国社会各阶级中的先进分子开眼看世界，并从各自立场出发从西方拿来各种各样的“学说”“主义”，提出自己的方案、主张，各种政治运动也接连而起，但却都以失败收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克思主义，为苦苦探寻救国救民道路的中国先进分子指明了方向。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革命改变了方向。这个方向就是一大确定的“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10]概言之，就是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方向，是俄国十月革命的方向。中国先进分子在解决向何处去的探索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也为中国向何处去提供了正确答案。

向何处去的问题有了答案，新的问题又出现了。通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路该怎么走，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开始并不清楚。中国革命所面临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里没有现成答案。中国国情虽与俄国相近或相似，但依然有许多不同，因而中国革命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也与俄国不同。中国革命的问题有许多，也有大有小，最根本的问题是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步骤、方法、前途等。对此，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在现阶段，中国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力量之一”，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之一”；^[11]农民阶级特别是贫农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12]工人阶级则是“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13]革命斗争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14]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整个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15]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构成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因为有了科学的理论指导，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也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革命本身并不是目的。中国革命的目的是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16]新中国成立，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一个新的在落后的东方大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又被提到中国共产党人面前。这个问题更为艰巨，也更为复杂，只能在摸索中前行。从新中国成立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段时间，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走了一个“之”字路”。先是探索出了一条正确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制度，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接着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中又取得了包括《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在内的一系列理论成果，理论和实践的探索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然而，随着“左”的思想发展，探索中断，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历史留下的问题还需要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努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命题。这是对历史留下的老问题的新表达，也是邓小平总结历史得出的结论。^[17]由此开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全部理论和实践探索的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大课题，其中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领导力量、依靠力量、国防外交、统一战线、“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党的建设等

一系列基本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科学解答，不断推进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对于这个过程和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巨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曾用“三个成功”即“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成功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8]作了精辟概括，给予高度赞扬。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留下的老问题，在经过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接续努力中终于有了答案。

然而，历史发展是辩证的，只有发展没有问题是不可能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既有过去留下的老问题，也有新时代面临的新问题，诸如经济上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政治领域贪污腐败现象频发多发，思想文化领域理想信念缺失，社会建设中收入分配差距较大，自然生态中环境破坏严重，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受到挑战，西方国家以“民主”“人权”为借口，从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军事等多方面对中国进行遏制和围堵，竭力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发展和国家安全受到严重挑战。如此种种都是埋伏在新时代的隐患，必须在新征程中加以解决。这些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而科学地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19]围绕新时代这一重大课题，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辛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时，这一思想是开放的，在新的征程上，我们还必须遵照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20]

百年历史表明,“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动力。因为,问题是实践中的问题,实践是知识发展的动力和检验真理的标准。同时,实践又是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问题,老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出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就是在解决一系列“老问题”和“新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开拓前进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历史留给我们的一条基本经验,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逻辑。

三、“世界的”和“民族的”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70多年前的欧洲。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所面对的是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实际,回答的是欧洲社会发展中提出的重大问题,制定的是欧洲工人运动的战略策略,因而是“民族的”和“特殊的”。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吸收了人类文明的精华,集中反映了时代的特点,回答的是人类历史之问、时代之问,因而能够超越民族界限的规定而具有世界的、普遍的意义。同时,马克思主义虽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它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实践中必然具有不同的形式。马克思主义阐明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为无产阶级政党和工人运动指明了前进方向,但是不同国家的国情不同,因而这些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等也不同。对此,马克思主义并不能提供现成答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不同国家共产党人根据本国具体实际,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本土化”,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世界的、普遍的意义才能得到彰显。概言之,马克思主义是世界的、普遍的,同时也是民族的、特殊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化、普遍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民族化、特殊化的过程,而每一次民族化、特殊化也是更为深刻的世界化和普遍化。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种世界化和民族化、普遍化和特殊化相统一

过程中不断实现了自身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涉两个根本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二是中国实际,实质是二者的有机结合。这种结合本质上就是“世界性”和“民族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人便不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和“民族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统一起来,并在这一过程中开创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创造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形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同时,那种将马克思主义“世界性”和“民族性”、“普遍性”和“特殊性”割裂开来的做法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危害,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把马克思主义“世界性”和“民族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统一起来的必要性。这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教条主义。教条主义的突出特征是一切从“本本”出发,割裂了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际的联系,“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21]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连续出现三次“左”倾错误以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在根本上就是受教条主义影响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历史所取得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是巨大的。理论上的巨大成果是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实践上的巨大成果是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独特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成就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巨大成功和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的独特样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和实践成果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是“世界性”和“民族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侧重的是“中国向度”,重点发掘的是“中国特色”,主要解决的是“中国问题”,是“中国的”“特殊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党的文献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和实践成

果下的定义中看到。以《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为例,在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行定义时,《决议》强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22]而对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的独特样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则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2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一百七十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24]也就是说,无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首先是“中国的”“民族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和实践成果也是世界的,具有世界的和普遍的意义。当今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政要、学者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所给予的特别聚焦就是明证。33种语言、发行覆盖170多个国家和地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在全球引发关注和思考。老挝副总理吉桥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视为“世界各国特别是老挝等社会主义国家推进理论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政治学教授拉迪卡·德赛说:“在今天这个充满了挑战的时代,我们不仅应该重温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更应该面向东方,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中汲取营养”,“中国共产党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为人类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参考”。^[25]中国共产党人自己也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

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26]

大家还应该注意“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个论断。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一论断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读,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说这一“新思想”不仅是“当下的”“中国的”,而且是“世纪的”“世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和实践成果这种“世界性”和“普遍性”意义,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人用世界的眼光、以世界的胸襟观察世界和中国的问题,在于用宽广视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坚持守正创新,不断超越自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和实践成果回答的是中国之问,也是世界之问、人类之问,是“世界性”和“民族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中国形态。只看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国样态”的“民族性”和“特殊性”而忽视其“世界性”和“普遍性”,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历史辩证法的漠视,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和实践成果更大、更深远价值的不懈。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和实践成果这种“世界性”和“民族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成就了中国共产党的辉煌伟业,也成就了中国共产党的世界影响。

四、“传统的”和“现代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空间上呈现的是“世界性”和“民族性”的关系,在时间上呈现的则是“传统”和“现代”的关系。如何认识和把握“传统”和“现代”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既涉及怎样对待中外历史文化及其现代发展问题,也涉及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老祖宗”及其现代发展问题,而在此讨论的重点则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老祖宗”和怎样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问题。

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历史上曾出现过两种态度,一是主观主义,一是实事求是。主观主义的

态度,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27]理论脱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僵化的教条和封闭的体系,忽视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发展性。毛泽东强调,这种态度“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28]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是“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29]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矢”去“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30]“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31]毛泽东指出:“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32]两种态度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带来的结果是不同的。中国革命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挫折在思想根源上都或多或少与主观主义思想作风有关,而实事求是,既不丢“老祖宗”,又“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在继承和坚持的基础上,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次飞跃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取得巨大成功的思想密码。

对中国传统文化,近代以来主要也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完全否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全盘西化论”,一种是固守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保守主义。这两种态度都是不正确的。正确的态度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否定观”,其要义是在继承中批判、在批判中继承,“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毛泽东曾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

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33]他还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34]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35]

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人自始至终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所以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也就有了思想认识上的保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历史中,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注意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时也注意把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而不是机械地引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问题。由此也就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党的十五大在对邓小平理论下定义时就明确强调这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党的十九大,在对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成果进行概括时命名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新思想”不是过去哪个时代的,而是“新时代的中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党在给毛泽东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进行界定时,虽然没有“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和“新时代”这种明确的说法,但其实这些思想的时代性特征也是非常明显的,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那个时代的,充分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现代性”,是“传统的”和“现代的”有机统一。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36]这种时代性虽然是历史的,但它所体现的恰恰就是那个

时代的“现代性”。

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传统”和“现代”的关系,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不能不涉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37]不仅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时还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38]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内在规定。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同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在实践中是同一过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过程中通过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其形式和内容的民族化,同时马克思主义也在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中,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既具有民族的形式,又具有特定民族所处特定时代的内容。以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创造的一些概念术语为例,如“小康社会”“群众路线”“以人为本”“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类命运共同体”“刮骨疗毒”“固本培元”“明大德、严公德、守私德”等等,这些概念术语,民族的特征、中国的风格非常明显,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同时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马克思主义在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中,使“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既获得了民族的形式和民族的内容,也反映了时代的要求,散发出时代的气息,实现了“传统”和“现代”有机统一。

总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中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获得巨大成功,取得丰硕成果,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了“连续性”与“阶

段性”、“老问题”与“新问题”、“世界的”与“民族的”、“传统的”与“现代的”辩证关系,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也是历史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我们应当珍视和遵循。

注释:

- [1][24]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261、22页。
-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50-651页。
- [3][5][6][18][19][22]《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
- [4]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3-24页。
-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5页。
- [8]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年第7期。
-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89页。
- [10]《中国共产党章程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第1页。
- [11][12][13][14][15][16][33]《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40-641、643、645、650、651、651-652、534页。
- [1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页。
- [20][37][38]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3、12、13页。
- [21][27][28][29][30][32]《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99、799、800、801、801、801页。
-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09页。
- [25]国纪平:《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而共同奋斗——中国共产党的世界眼光》,《人民日报》2021年6月26日。
- [26]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8页。
- [31]《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9页。
- [3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72页。
- [3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13页。
- [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4页。

[责任编辑:马立钊]